

“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综述

欧阳烈 丹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于2001年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辽宁、上海、天津、吉林、黑龙江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日本的教科书修订问题,同时还对日本侵华的诸多事实进行了探讨。教科书修订问题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猖獗的结果,自90年代以来,右翼教育团体得到文部省支持,编撰所谓新版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内容被大幅删除;日本古代的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传说,被当作史实向青少年灌输;“自由主义史观”、“皇道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泛滥。该次教科书倒退浪潮持续至今,并有日益复杂化趋势,已引发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严重关注。

一 教科书修订与日本右翼势力问题

据统计,日本至少7家出版社已出版修订过的历史教科书,右翼教育团体正在全力推动要于2002年在全国被正式采用。与会者一致认为新版教科书的送审本中掩盖和回避了很多重要的侵略事实,这是明显的历史性倒退事件。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寰认为教科书问题不是偶然的,

是国际大气候和日本小气候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应放到美、日、中三角关系上来认识,应看到“看不见的美国手”所起的作用。特别要看到这是冷战时期、1951年旧金山片面媾和以来的大问题。他指出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在侵略问题上和“皇国史观”没有大的区别,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重新炮制的“皇国史观”。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指出2002年版送审本教科书与1997年版教科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日本侵略亚洲特别是侵略中国的问题的表述上。如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侵略”一词、七三一部队在表述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教科书问题与日本的政治倾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教科书最近的动向是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结果,表明了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退步。他建议今后应多注重实证性研究,让日本的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日本的侵略事实。教科书问题也关系到今后的中日关系,应给予重视。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刘毅教授认为修改教科书一直是日本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事项。教科书问题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应该对教科书问题产生的背景进行冷静客观的研究:教科书问题是明治维新以来皇民化教育的结果;从日本的精神构造和文化特征来看,从1195年第一个幕府政权建立以来,武士的价值观念成为整个国民的价值观念,使日本成为培育、滋生右翼思潮的沃土;教科书问题也是冷战的后遗症,美国在战后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导致了后来右翼思潮的泛滥;同时,日本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也为日本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

刘毅认为日本右翼存在“政、官、财、学、媒”五位一体的结构。在政界,政府构成了战后日本右翼的重要基础;在官界,日本的职业官僚是修订教科书的实际操作者;在财界,日本右翼政党团体都有大企业的支持;在学界,90年代以后,日本知识界出现了严重的

右倾化趋势;在媒界,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右翼书籍和报纸。日本右翼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活动越来越频繁,否认战争,美化侵略的层次也越来越高。

二 中国历史学者应该坚持的立场

在会上,很多学者还谈到了在对修订教科书问题和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批判时,中国的历史学者应承担的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就分析的方法论发表意见,认为日本反对右翼的势力也比较大,应该注意不要把团结的对象作为批判的对象。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日本侵略的历史,21世纪中国的历史学者应该联合日本的左翼学者深入研究20世纪的诸多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苏智良建议国内学者应该促进国际法学界组织国际法庭,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判决,在日本承认战争责任前,应免谈日本常任理事国问题。在外交上应主动,应该具有对日本右翼进行斗争的中长远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宁一认为要充分认识到事态的紧迫性。他建议中国现代史学会、日本史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作为民间学术团体发表声明,采取支持日本左派,而不是声讨右派的态度,给外务省对文部省的牵制以侧面的声援。针对中国对日本右翼的批判缺乏组织性的情况,他主张国内学者应分工合作研究教科书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建立中、日包括东亚学者在内的联合会,以联合日本左翼学者共同和右翼进行斗争。他呼吁中国政府应对日本财界施加压力,对不同倾向的财团采取一定的区别对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认为一方面要全面准确地估计日本的形势,不要过分夸大日本的右翼力量,应看到日本的和平民主力量;另一方面要充分估计日本修订教科书问

题的严重性,给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历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所为,也应有所不为。他建议:要把个案研究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加强对日本的基础研究;要把深入研究与开拓性研究结合起来;采取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回应方式;反对右翼的同时,给左翼以有力的、实际的支持;努力实现中国法庭承担中国受害者起诉的目标;利用国际法,一步步地解决日本侵略战争的战后遗留问题;出版系统应尽快地把有关日本侵略史的中国书籍翻译成日文和其他外文,以引起日本和全世界更多人的关注;综合全国的研究成果,可以就具体问题召开专门讨论会。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刘金才提出应加强对日本的文化研究,以形成独立的对日观;也应加强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研究;同时,可以通过对战争与文明关系的研究来研究中日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振鹄认为,日本对教科书的修订是把教育现在的国民和教育下一代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问题长期化。从表面上看教科书修订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实际上孕育着再度向外侵略的因子,应提高警惕,中国的历史学者有责任对此进行揭露、谴责。应联合起来加强对日本史、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同时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实现研究成果的普及化。

三 对日本侵略掠夺暴行的实证性研究的重要性

在会上,一些学者还对细菌战,慰安妇,化学战等战争遗留问题进行了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指出慰安妇问题不是象日本所宣扬的那样只是商业行为,大量证据证明它和政府、军队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应该为慰安妇问题承担战争责任。他特别介绍了2000年东京民间国际战犯法

庭的情况: 经过初审, 法庭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应对实行慰安妇政策承担责任。苏智良还介绍了慰安妇研究中心在慰安妇研究上所做的大量工作。目前经过研究中心的努力, 在大陆已经找到了 57 名受害者, 而由于社会压力等各方面的原因, 没有证言的受害者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认为中国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的受害者至少有 20 万人。由于证人的不断去世, 慰安妇研究已经到了最后调查的关头。

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报告了 10 年来他在中国各地对细菌战进行调查的情况, 回顾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历史, 指出日本在中国的细菌战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 最残酷, 杀人最多, 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步平以大量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向与会者介绍了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的情况, 指出这些武器使中国的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会议还对其他有关伪满洲国、日本侵略与殖民掠夺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刘毅根据“主权大于产权”的理论, 指出日本通过以主权取代产权的方式在东北获得了无法估量的殖民收益, 驳斥了日本右翼有关殖民地财产的说法。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对于该类遗留问题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因为许多当事人年事已高, 如不及时调查, 许多史实就会永远消失。所以这种实证调查具有抢救的性质。希望这次讨论会的成果能够促进各方面的重视, 转化为社会成果, 加深社会各方面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现状的了解, 促进中日关系能够真正健康的发展。

(作者欧阳烈丹, 1972 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维木)